



坚定文学信心

□王充闾



人文传承书。该书着眼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体现了大文化的理念,内涵既侧重于意识、精神、观念形态,又兼顾人文地理、社会风习、生活哲学。写法上不是从“国粹”的一般范畴入手去展布知识格局,进行定义阐释、逻辑演绎,而是以散文形式,钩沉蕴含国粹文化的诸般命题,以事为经,以情为纬,独辟蹊径地写出中华传统的人文情怀、文化观念、价值选择、心灵空间和统摄诸多国粹文化因子的精神脉络。顺着这个路子,接下来我又写出了它的姊妹篇《文脉:我们的心灵史》。

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作了一部三卷本的《诗外文章——哲学历史文化的对话》,对上世纪先秦下及近代的有代表性的哲理诗进行赏析、剖析,每诗一文,写成近五百篇随笔,依托哲理诗的古树,绽放审美鉴赏的新花,开辟一方崭新天地。散文从诗歌那里领受到智慧之光,较之一般文化随笔,在知识性判断之上,平添了哲理趣味,渗透进人生感悟,蕴含着警策的醒世恒言。而历代诗人寓意于象,化哲思为引发兴会的形象符号,则表现为一种适度的点拨,从而唤起诗性的精神觉醒。由于是诗文合璧的“连体婴儿”,我更注意把握其富于暗示、言近旨远、意在言外的特点,运用形象、想象、意象与比兴、移情、藻饰等手法,以利于创造审美意境,拓展艺术空间。

此前,香港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分别出了《国粹》《文脉》的繁体版,香港媒体采访中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基于新科技的影视与网络等电媒传播充分展示其诱人魅力,博得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增大、心理感到疲惫的现代人的追逐,而传统的

纸介传播则失去了往昔独霸天下的优势。那么,你这种凭借文字纸本展现思维功力与审美追求的纯文学写作,是怎样坚定文学信心,闯关夺隘的?

我说,面对这种新的文学环境,作为写作者,无论从应变能力、文体把握、思维方式、精力活力、现代语言特征哪方面看,我都不具备优势。之所以还能通关,应该感恩时代、感恩文学,这里也有编辑、出版的艰辛劳绩,所谓“好风凭借力”吧。

“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这种文化自信,给了我有力的理念支撑。又兼创作方向比较明确,秉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求,我对传统文化中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此其一。

其二,文学本身强大的功能,借助书籍这一载体,其整体性、深邃性、恒久性和丰富的思想蕴涵、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包括古汉语之独特魅力得以充分展现,为新媒体所无法取代。

其三,在面对新媒体的各种挑战中,认真吸收它们贴近读者、贴近生活、快速敏捷、灵活多样的经验,进一步强化读者意识、发展新的文学形式,探索新的文学可能,从中受益匪浅。

其四,实践表明,读者及其审美需要是多层次、多取向的;中文文苑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足够大的容量,各种载体尽可百花齐放,共存共荣。

其五,读书日益成为现代素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是新兴的网络文学,同样有一个从稚嫩粗疏到完善提高的过程,随着法制观念的增强、创作实践的磨炼,报纸、杂志、电视的引导,如开展评选优秀作品、先进写手活动,都会逐渐提升新媒体作者、读者的创作欣赏水平。

总之,我对未来文学的发展前景是满怀信心的。期待这次作代会进一步明确创作方向,提振信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努力再创新绩。



作家的「坐标」

□王松

又要开作代会了。上次作代会是2016年,5年时间,今天想想一切历历在目。这不禁让人有些感慨,对作家来说,每次的作代会就如同是在一个时间的坐标轴上,沿着这个坐标轴,每次作代会都是一个有特定意义的坐标。在这些坐标上,既有大家的共同记忆,也有每一个作家自己的记忆。此时才感觉到,什么叫“光阴荏苒”,时间本来是一年一年周而复始地过,就每次作代会而言,却是似乎提速了5倍,一下子就是五年。一旦意识到又要开作代会了,也就不自觉地回忆起前面的作代会,接着也就开会,在这段时间里自己都想起了什么,干了哪些事,又写了哪些东西。

我在这五年里,简单说就做了三件事。一是尝试着沿历史长河逆流而上,也就是沿着纵向的时间坐标轴去追寻一些东西;二是沿着横向的现实坐标轴一步步走向当下的深处;第三件事,则是一直在努力寻找这历史的纵轴与现实的横轴的交叉点。这是因为,当我沿着这两个轴走得越远,也就越意识到,它们的交叉点不仅是平面的,也是立体的,在这个交叉点上既蕴藏着我要解开的密码,也有可能隐藏着我为创作的“变量”。具体说,在这五年里,我越来越感觉到,天津竟然是一个如此令人着迷的城市。

而让我意识到这件事的契机,竟然是“挂职”。2016年,是我去天津市宁河区(当时还叫宁河县)挂职的第二年。宁河早期虽然是天津的一个郊区,但在地理位置上离天津城区很近,所以天津的城市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对这一带早有渗透,乃至融合。尤其近些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里已是天津城区与乡村的结合部。我挂职之前,在天津是“身在其中”,而到宁河之后毕竟拉开一些距离,再回过头来看天津,似乎就更清晰了。我想,这至少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此外,宁河是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尽管这些年我也走过很多乡村,在有的地方甚至扎得很深,但在意识里,宁河这里的农村一直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可这次来挂职才发现,今天的宁河早已不是我当年在村里考上大学、蹬着用水管焊的破“铁驴”自行车来县城办各种手续和“关系”时的样子。我曾经插队的村庄,与我所写的《双驴记》时的境况也已经判若云泥。也就从这时,我开始有意识地走向宁河当下的深处。这也是我沿着现实的横向坐标轴拓宽视野,重新了解这片曾经熟悉、现在已有些陌生的土地又一个起点。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产生了另一种感觉,对天津这座城市也有了一种沿着历史的纵轴去探寻的欲望。其实在此之前,这件事也做过,但此时的感觉已完全不一样了。

这以后,也就有了《烟火》和《暖夏》这两部长篇小说。这两部长篇小说的责编兴安先生曾说:“如果说,《烟火》写了天津的百年历史,那么《暖夏》则是抒写当下的现实……两部小说一先一后,反映了天津新与旧的两个时代的变迁。”他的话一语中的,如果将这番话换一个说法,也就是这两部小说,都是生长在前面所说的历史纵轴与现实横轴的交叉点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现实的横轴,将我的视角一下从“半亩方塘”拓展到广阔的原野,而历史的纵轴,也将长河之水引入我创作的“源头”。我觉得,这也正是我一直努力寻找的两轴之间的交叉点。同时,我也很清楚,要解开这其中蕴藏的密码,可能要用毕生的精力。

风过呼伦贝尔

□黑鹤



前几天,我刚刚从呼伦贝尔草原的营地回来。附近牧民朋友通古勒嘎大叔家的羊群过莫日格勒河时,因为冰面破裂塌陷,落入冰河中。

冰面坍塌时出现一定的向河中间倾斜的角度,所以我在冰面上站立已经相当不容易,而羊受惊之后紧紧地挤成一团,无论怎么哄赶都一动不动,宁愿泡在冰水中绝不踏上光滑的冰面。没有放过羊的人永远不会知道羊的执拗,它们一旦受惊习惯的自保方式就是挤成一团,然后就那样挤在一起,直到地老天荒。你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将它们弄开。唯一的办法是只能拎起最靠近的羊,直接将它们扔到河边的土岸上。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一只羊的体重大概五六十斤,距离河岸的斜坡大概三米左右,必须使出全力将它们扔过去。如果稍微泄力羊落在冰面,它根本无力爬上河岸,会直接重新滑下来,融入挤成一团的羊群。一切就得从头再来。

忙了整整一个上午,终于将所有的羊都拖上岸,也没有任何人冻伤。我自己以前打球时的腰伤又复发了。但是对于草原上的游牧人,这确实就是日常生活而已。游牧人的坚忍生活从来不是外来旅游者看到的绿野牧歌。

这些年的作品都是以中国北方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森林为背景,我在努力了解北方民族的地域变迁、文化沿革、生活方式及群体意识,创作主要以蒙古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民俗传统为基础,通过小说的形式重构北方少数民族的荒野文化,寻求人类与自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我回忆自己参加第九次全国作代会讨论时的发言,记得自己当时说的一个主题是深入生活,另一个主题是作品的对外输出。总结一下,这五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我没有牧民的身份,但我像牧民一样生活。个人最大的收获就是身处草原,意味着我将拥有更多获得丰富素材的机会,牧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中蕴藏着伟大的文化与传统,这些是我创作的源泉与力量。

关于作品的输出。五年来我和我的团队以及出版社有意识地更多与国外的出版机构进行沟通。在疫情前的各个国际书展上,我也通过个人的关系与很多世界各地的翻译进行交流,希望尽快建立一些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的平台,让更多国外的读者看到来自中国作家的作品。五年来我的作品又翻译成十余个语种在国外发行。对于国外的出版社,我的要求很简单,我的书必须在国外的书架上真正地出售,我必须能够获得版权。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国外的读者看到呼伦贝尔无边的草原和大兴安岭广袤的森林,让他们了解美丽的中国。

作为一个自然文学的写作者,我的作品更容易吸引孩子,我也理所当然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

●我一直相信,一个写作者的作品,对他的读者的影响,甚至会超过个体生长环境的塑造力。我想让孩子们知道,阅读的真正意义和力量可以让他们摆脱他们曾经生活的原生环境。

这五年来我去过很多遥远的地方。我向无数个孩子讲述我的成长,我想通过我个人的一切,让孩子们看到阅读带来的可能性,因为我就是一个阅读真正的受益者。我永远记得那些黄昏,做完讲座的我在小饭馆吃完晚饭之后,走出总是可以看到有孩子手捧着我的书,站在门口等我。在看到了我的那一刻,他们的眼中闪着光芒,他们是我的读者。我的书比我更早来到这些如此遥远的地方。在创作了这么多年之后,我第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我愿意为中国新时代的童阅读提供更多优秀的自然文学作品。

深秋时节,应邀去参加一个青年颁奖活动。会上,一个年轻记者拿着录音笔问我,请问您对青年作家有什么希望?我一下懵了,支吾半天,才勉强应答出几句,都是些没意思的话。事后感觉很懊恼。

以写作抵抗衰老

□裘引引



学排行榜若干。虽然没有写出什么鸿篇巨制惊涛文坛,但我一直在写,不知不觉地竟写了这么多,连我自己都有些意外。

一个重要原因是,退休了,所有的时间都属于自己的,可以安心写作,自然写得多了。其实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断在对自已说:如果你不想老得太快,就要努力写。我真的是以写作在抵抗衰老,以写作在养生。

我在文学道路上起步很晚,发表第一篇小说时26岁了,出版第一本书时33岁。第一次参加作代会时43岁了,那是2001年第六次作代会。然后第七次、第八次、第九次。每五年见一回老朋友,真的是见一回老一回。我看见朋友们日渐老去,朋友们见我肯定如此。真的是颇为伤感。而这五年,我更是老了一大截,除了大家看得到的白发皱纹,还有看不到的病痛,各种零部件都在迈开衰老的步伐。有位很久不见的作家见到我时忍不住叹道,你也老了!

每每此时,我内心的心理医生连忙出急诊,告诉自己,老是必然的,不管你干哪一行;何况能和朋友们一起老去,是件美好的事;能在写作中老去,也是一件美好的事,能在老去时,依然有很多读者喜欢你,更是一件幸福的事……我安慰起自己来,真是一套一套的。需要安慰,说明真的老了。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我宁可华发丛生,满脸皱纹,也不想让自己的创造力减退。但只要面对电脑时依然能噼里啪啦的敲打,妈妈就因为我,因为唯有在写作时,我会忘记年龄。唯有在作品里,我可以“装年轻”,唯有踏上文学之路,我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我是多么庆幸自己,选择了写作作为终生职业。

前几天,一位“80后”读者对我说,山山老师您一定要写下去呀,我希望我80岁时还能看到您的作品。我说,那我非得活到110岁?她说,您要学马老(马识途)学习嘛。

好吧,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拥抱现实,与时代共振

□范墩子

年作家的优势,在于我有着深厚的乡村生活经验,很多的乡村记忆是独一无二的,因而我应该向生活取经,把自己身在西北地区对时代变化的认知和感受用小说写出来。有了这个想法,似乎迷茫已久的路上忽然照进来一束光。于是,一到周末,我就坐大巴车回到村上,翻看县志和一些史书,集中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变迁史,谋划着要写出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来反映那个时代的深层变化。

那段时间,我相继发表了中短篇小说《鬼火》《灵光》《食草人》等,总算为自己找到了写作的领地,尽管那时写作上依然不够成熟,但总归是看到了一丝希望。2016年年底,我看了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盛况,一字不落读完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那几天,我一直在网络上阅读大会的报道以及许多作家的发言,我深受鼓舞,心里更加坚定了自己写作的方向,且不住地渴盼着未来也能去参加这样盛大的会议。

令我万分惊喜的是,才刚刚过去了五年,我便接到了参加作代会的通知。内心的喜悦不言而喻,我想这是对我写作最大的肯定,这也更能说明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在乡村写作不被普遍看好的情况下,我更要坚定信念在乡村生活里深掘。我想到路遥,当年路遥孜孜不倦地向柳青等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学习,坚定地采用现实主义结构自己的作品,赢得了亿万读者的喜爱。

路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时代记录者,他清晰地捕捉着时代的每一处微小变化,并把这些变



化用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表达出来,正因如此,他的小说现在读起来,依然没有丝毫的生涩感,依然能感受到曾经热气腾腾的生活和作家真诚的心。在对乡村生活深入思考和挖掘了几年后,我打算写一本长篇小说来反映我心中的这个时代,于是,2019年的那个暑期,觉得构思成熟了,素材积累得差不多了,我便在永寿县城开始了这场马拉松写作。

此时此刻,独坐书房,窗外鸟声阵阵,阳光正好。得知自己将要参加第十次全国作代会,心情同冬日的阳光一样,温暖明媚,这是我首次参加全国作代会,在我个人创作历程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收获,也代表着无上的荣光。参加这样的盛会,现场聆听国家领导人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必然对以后的写作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习近平总书记第九次全国作代会上的讲话,依然在耳边回响。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回望自己的写作路,着实感慨万千。很多美好的记忆涌现出来,曾经的那个热血青年仿佛重新站在了面前。十年前,我怀揣一份美好的憧憬开始写作,先写诗歌,后转小说,但这条路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好走,尤其是2015年大学毕业后,对未来充满迷茫。那时候,我在一家报社当记者,写作素材上的匮乏更是让自己陷入艰难的处境。去哪儿寻找自己的写作资源,是摆在我面前的首要问题。

冷静地思考了一阵子后,我想我作为一名青